

浅析马丁·特罗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论理论内涵

★ 王思民 (江西中医学院 南昌 330006)

★ 金成浦 蔡新卫 (江西省瑞昌市中医院 瑞昌 332200)

摘要:根据马丁·特罗教授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后,高等教育的类型与规模、高等教育本质、高等教育功能、课程以及教学形式、学生、教师、学术标准、学术管理形式、领导决策、入学与选拔、高等教育的内部管理等等与质的十一个规定性将呈现出不同的特性,通过介绍这十一个因素在三个不同阶段的比较研究成果,以期对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的处理精英教育与大众化教育关系起到借鉴作用。

关键词:马丁·特罗;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论

中图分类号:G 640 **文献标识码:**A

1 马丁·特罗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论”理论的形成

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概念源自 18 世纪在欧洲推行的“大众基础教育”,并由此奠定了大众初等教育的基础,随后逐渐延伸至中等教育阶段。到 20 世纪初,随着越来越多的高中毕业生进入高等院校,出现了大众高等教育的趋势。美国在 1862 年开始的赠地学院运动加速了高等教育民主化的进程,使更多的青年有机会进入高校,高等教育的规模日益扩大。同时,受德国柏林大学学术研究自由精神的影响,美国一些高校开始推行选课制,使高等教育的课程学习更为自由,青年的学习机会也更多了。1944 年颁布的《军人权利法案》和 1958 年通过的《国防教育法》更极大地促进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大规模发展,使其率先于 20 世纪 40 年代完成了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转变,之后又于 70 年代初向普及高等教育

转变。在此背景下,美国著名教育社会学家、加州伯克利分校的马丁·特罗教授在对高等教育发展过程进行长期关注与研究后,于 1962 年撰写了《美国高等教育民主化》一文,首次提出了“大众高等教育”(mass higher education)这一概念。在 1970 年美国高等教育的学生数约占适龄人数的一半时,马丁·特罗教授在《从大众高等教育向普及高等教育转化的思考》一文中提出了“普及高等教育”(universal higher education)的概念。1973 年,马丁·特罗教授在考察美国高等教育“量”的扩张和“质”的变化的基础上,发表了《从精英向大众高等教育转变中的问题》,将高等教育发展进程分为精英、大众和普及三个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阶段,对这三个不同阶段质的变化特征作了规定性论述,初步形成了著名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的理论体系。“阶段论”对我国

学,还有待于研究。但做了总比等待的强,陈教授做了“白虎汤降低家兔气分证体温的实验研究”,证实了白虎汤有明显的退热作用。而其退热效果又不如分别在白虎汤中加入活血化瘀或养阴之品的复方。并在实验中通过观察血小板、血小板聚集率血栓素 B₂ 和 6-酮-前列腺素 F_{1α} 等指标,证实了温病气分证就有瘀血的存在。在白虎汤中加入活血化瘀之品,创制“清气化瘀复方”,明显提高疗效。另一实验证实白虎汤中加入养阴之品,治疗温病气分证疗效高于白虎汤,从而得出治疗温病气分证应注重清热养阴与活血化瘀的观点,较之前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中医另一类的科研就是临床研究,这是大多数中医临床工作者都可进行的,其实这就是临床工作的一些观察总结,只不过是按照一定的规范进行而已。但这对一个中医教师来说是很重要的,甚至是不可缺少的。将自己的临证工作作一些总结,既可

成为教学的素材,又可以加深自己对理论的理解,甚至修正前人的错误。陈教授在临床时对糖尿病、肾盂肾炎、胃肠病、心肌炎、关节炎等都作了仔细地临床观察,并有自己的心得体会,撰写了《中医治疗糖尿病之管见》、《藿砂合剂治疗急性胃肠炎 23 例》、《心肌炎的中医治疗》及《自拟痹汤对类风湿性关节炎疗效观察》等文章,足可启发后学。

在创建中医学院时,都是选调中医理论深厚、临床技术高超的中医师担任教师之职,他们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代表了一代中医的水平。现在的中医教师能否代表中医的水平?还必须进一步评估认定。中医与西医不一样,西医的理论来自实验室,中医的理论须到临床中去领悟。中医教师,肩负着中医继承和发扬之重任,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中医的兴衰存亡。

(收稿日期:2005-09-29)

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影响较大,中国政府就是据此制定了我国的教育宏观发展目标,在《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和《教育事业“十五”规划和 2015 年发展规划》中都明确提出要采取各种措施积极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入学率在 2010 年接近 15%,使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

2 马丁·特罗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论”主要内容

马丁·特罗教授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核心内容概括起来可分为“阶段论”、“模式论”、“质量观”、“就业观”和“多样性”等五个方面内容。本文着重介绍对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影响较大的“阶段论”理论。

马丁·特罗以美国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中的量的扩张和质的飞跃为准绳,把高等教育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当一个国家高等教育所接纳学生数与适龄青年的比率在 15% 以下时,属于精英(Elite)高等教育阶段;15%~50% 为大众(Mass)高等教育阶段;50% 以上为普及(Universal)高等教育阶段。特别提出的是,所谓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是就高等教育的总体而言,并不排斥而应包括精英教育作为它的组成部分,不能误认为高等教育发展大众化阶段就不要精英教育了。

在这三个阶段中,高等教育类型与规模、高等教育本质、高等教育功能、课程以及教学形式、学生、教师、学术标准、学术管理形式、领导决策、入学与选拔、高等教育的内部管理等等 11 个规定性将呈现出不同的特性。

2.1 高等教育规模 特罗教授认为,一些国家的精英高等教育,在其规模扩大到能为 15% 左右的适龄青年提供学习机会之前,它的性质基本上不会改变。当达到 15% 时,高等教育系统的性质开始改变,转向大众型。如果这个过渡成功,大众型高等教育可在不改变其性质下,发展规模直至其容量达到适龄人口的 50%。当超过 50% 时,即高等教育开始快速迈向普及时,它必然再创新的高等教育模式。

2.2 高等教育本质 特罗教授认为,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增加与人们(包括学生及其父母、大学教师和管理者)接受高等教育的观念密切相关。精英高等教育阶段,由于入学人数极为有限,接受高等教育被普遍认为是出身好或有天赋或两者兼备的人的特权;当入学率提高到 15% 左右,进入大众阶段时,人们开始逐渐把接受高等教育看作是那些具有一定资格者的一种权利;在入学率高达 50% 以上的普及阶段,接受高等教育越来越被看作是一种义务。

2.3 高等教育功能 精英高等教育主要是塑造统

治阶层的心智和个性,为学生在政府和学术专业中充当精英角色做好准备。在大众高等教育阶段,高等教育仍然是培养精英,但这是一种范围更为广泛的精英,包括社会中所有技术和经济组织的领导阶层,重点从塑造个性转向培养更为专门的技术精英。在普及型高等教育机构,它的主要目的是提高人们对迅速变化的社会的适应能力,培养对象是社会所有的人。

2.4 课程以及教学形式 在高等教育发展不同阶段,课程和教学形式的特征也不同。精英高等教育的课程倾向于高度结构化,反映学位课程的学术概念或专业要求的概念。课程主要由期终考试的特点来决定,具有高度专门化,并且由教授们按培养有教养的人或称职专家的素质标准来设计。在大众高等教育阶段,教育更加模块化,其特征是半结构化的课程序列,即逐渐取得学分(在模块课程中可以互换),使课程更加灵活,更加容易接受,并且在主要领域或高校之间更加容易流动。普及高等教育的初期,仍存留有模块课程,但教学的结构日趋式微,课程之间的界限被打破。由于没有为人们所共识的高等教育概念,并且学习和生活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学术形式、结构和学术标准的地位发生动摇,并扩展到考试和评价之中,所以很难确定课程的要求。普及阶段高等教育中新出现的高教机构只是另外一种经历,是为一个人处理现代生活问题提供资源,性质上同现代社会中的其他经历没有区别。

这三个阶段的教学形式和师生之间的关系也各不相同。在精英高等教育阶段,教学的最大特点是个别指导,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为个人关系,这与塑造个性及培养精英的核心功能相协调。在大众高等教育阶段,重点是强调传授知识和技巧,正常的教学逐渐通过演说进行,以讨论式教学为补充。在普及高等教育阶段,学生和教师之间直接的个人关系附属于学生更广泛地面向新的或更为复杂的关系前提,这更多地依赖于函授、电视、计算机和其他技术的帮助进行教学。

2.5 学生 在精英高等教育阶段,学生通常是完成中等教育后直接进入高等教育,学生住校并且不间断地(假期除外)学习直到获得学位。他们学习和参与竞争的目的是为了学术荣誉。在大众高等教育阶段,虽然越来越多的学生工作或旅游一段时间后才入学,但大部分学生仍是完成中等教育后直接进入高等教育,入学日益容易,学生学习水平参差不齐,导致较高的“浪费率”。学生是寄宿与走读相结合,同时,职业训练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普及高等教育阶段,延迟入学现象较普遍,“时学时辍”现象层出不穷,并且大多数学生具有就业经验。伴随终身教育的兴起,正规教育与其他生活经历之间的界限日渐模糊。

2.6 高等教育的类型与规模 精英高等教育具有高度统一性,各高等院校具有较高的共同标准。大众高等教育虽然在允许学生和教师流动的高等教育系统的几个部门之间有一些联系,将更加具有综合性,标准更加多样化。普及型高等教育机构的特点更加多样化,它们之间没有共同的标准。

在这三种系统中,典型的学校模式在规模和特点上也存在不同。精英高等教育机构一般是两千至三千寄宿学生的小社会。如果规模超过了三千学生,它们将被分成几个分校(院),这些分校(院)就像牛津和剑桥大学的学院一样,规模相对较小。大众高等教育的标志是综合性学校,它们不是小社会,而是由三四万学生和教师所组成的寄宿和走读相结合的“大学城”。普及型高等教育机构的规模不受限制,把人们聚集起来只是为了教学,其中大多数学生很少或从来不去主校园,他们几乎没有共同之处,不构成任何意义上的有密切联系的小社会,没有共同的标准、价值观和身份。

从学校与社会的界限而言,精英高等教育机构与外部社会被清晰而严密的界限甚至被坚固的围墙隔离开来。在大众高等教育阶段,高等院校与社会的界限仍然存在,但较模糊、较容易渗透。在大众型高校之内或之间,流动相对较为容易,而且学校“成员”的概念不甚清晰。在普及高等教育阶段中,学校与社会的界限已经很小,并逐渐消失。在某一时刻,任何一位打开电视机收听电视讲座的都可以被视为那一时刻“电视广播大学”的一位成员,而他当时是否按时交作业或已注册入学则无关紧要。

2.7 领导与决策 在精英高等教育机构中最高的领导与有效的决策,是由相对少数的精英群体——行政机构的领导、政府官员、大学校长所控制,他们是政治、经济和学术方面的领导者。他们相互了解,并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和思想观念,往往是通过非正式的直接接触做出决策。大众高等教育机构虽然继续受这些精英集团的影响,但更多的受“民主”政治程序的制约,并受学生、历届毕业的校友、以及各政治党派的影响。当高等教育转向普及时,高校的影响面更大了,不仅影响那些过去或现在受高等教育的人,而且波及他们的亲朋好友,他们往往通过致函给官员、通过投票选举的方式来表白自己的态度。总之,在普及教育阶段,越来越多的公众介入了高等教育

的领导与决策。

2.8 学术标准 精英高等教育阶段,或在精英高等教育机构中,一般有着共同的、相对较高的学术标准;大众高等教育阶段,学术评价标准趋向多样化,在不同的机构和系统中其标准的严密性和特点均各不相同;普及阶段时,虽然也有不同的成就评价标准,但这种评价标准与初等和中等教育的非学术评价形式一样,凭借教育经验的“价值增殖”成了普及高等教育的评价依据。显然,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判断个体和学校活动的传统的评价标准。价值增殖成为教育成功的标准,这使不少学校愿意招收学术水平较低的学生而不是较高的学生,因为要提高那些低起点学生的水平比高起点学生的水平更加容易。这个观点促成了开放招生的原则。

2.9 入学和选拔 在精英高等教育阶段以出身和地位为依据的入学标准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被以特定的考试成绩和中等学校表现的“英才成就”所代替。大众阶段,作为入学限制条件的英才标准虽然仍为人们所普遍接受,但被教育机会均等观念冲淡了,人们通过补偿性计划和引进其他非学术标准来减少丧失了受良好教育权利的社会群体和阶层的入学机会的“不平等”。到了普及阶段,高等教育对所有希望入学或有资格入学的人开放,其标准是个人是否愿意进入大学。普及高等教育的目的是使高等教育中社会阶层、种族和民族的分布合理,实现群体成就的平等而不是个体机会的平等。当然,高等教育越接近招收全部适龄人口,就越能紧密地反映人口中亚群体的分布状况。在欧洲国家大众和精英高等教育之间的转型时期内,这种依据个人意愿入学和选拔已经出现。

2.10 学术管理形式 典型的精英型大学是由学术人员兼任行政职务,他们实质上是非专职的行政管理人员。在一些国家,它们还可能在国家专职行政人员或注册管理员的帮助下处理日常事务或财政问题。但管理的领导者通常是选举产生或委任的,任期限。到大众阶段,高等教育机构的规模日益扩大,功能也逐渐多样化,行政管理人员队伍也随之扩大,以前的行政领导,现在成了大学的专业管理者。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逐渐向普及化阶段转变,巨大的成本需要更大的财政责任和更复杂的管理形式。大学聘请越来越多的全日制专家,比如制度分析家、精通计划预算的经济学家。这个阶段大学的理性化管理出现了问题,因为大学自身的功能更加多样化。

2.11 高等教育的内部管理 在精英高等教育阶

段,高等教育的内部管理是由高级教授担任的,那些不具备此资格的人员在主要的机构决策中仅起很小的作用或不起作用。随着高等教育机构特别是非专业人员的增加,后者逐渐对所谓的教授治校的垄断权利提出了挑战。在大众高等教育阶段,不同层次的初级工作人员享有校内管理权。而且学生不断拥有影响决策的权利,学生参与的形式和程度成为从精英向大众化转型过程中的主要问题。在精英高等教育中由于其功能狭窄,师生群体相似,学校的基本特点和价值观能够被老师和学生广泛接受。而在向大众型转变过程中,其功能更加广泛,学生和教师类型更加多样化,他们来自各种背景,对于高等教育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持有不同的观点和观念。同时,兴趣和态度同高级教授差异显著的初级工作人员也获得了权利和影响力。来自各种背景并受激进的政治潮流影响的学生,对大学传统的价值观和理念提出了挑战。在许多高校中,构成精英高等教育基础的师生一致性意识崩溃了。同事之间以及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不再拥有共同的观点,而是逐渐不确定,变得越来越紧张甚至产生冲突。在普及高等教育阶段,高等教育也出现了社会政治机构中既常见又容易控制的利益和观念的冲突。对此,特罗教授认为民主参与形式可以引入高等院校的内部管理。

另外,当今的高等院校还可引进校外人士参与高校的内部管理。当今大学政治化几乎是所有发达社会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在于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维持多样性的结构,允许各组成部分和单位保持各自的独特性和相对狭窄的功能,教师和学生拥有适合于自己学校的共同的态度和价值观。单位内部意见的一致性完全与单位之间和较大系统内高等教育形式和观念的多样性相适应。但是如果整个系统的多样性反映在每个组成部分内部而无法达到一致时,那正如我们在一些国家所看到的强大的权力和有效的决策不可避免地大学流向政治权威手中。而他们的权利基础不是他们在高等教育中的作用,而是在于整个社会的政治活动。价值观的不一致性以及激烈的政治价值和利益的冲突导致学校内部管理的崩溃,从而削弱了大学的自主权;人们必须做出决策并以社会广泛接受的方式进行资金筹措,如果学校内部不能进行,那么应由校外人士或委托人来承担。

3 马丁·特罗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论”理论的贡献

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发展历程,提出了高等教育分阶

段发展,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特征,并首创性地以高等教育所容纳的学生数量占适龄人口的比例(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作为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规模扩展程度并划分其发展阶段的量化指标。尤其重要的是,他还对所划分的各阶段的质的区别作了多方面的分析,总结出关于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的量变和质变相互依存、互为前提的发展理论,即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他的这一理论在1973年一经提出,立即在欧美引起了巨大反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每年一度的《统计年鉴》也于1974年增加了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这一统计项目。之后,西方多数学者在探讨高等教育大众化问题时,几乎都引用了他的思想,并在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与充实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理论。

将高等教育量的扩张与质的变化二者密切地结合起来的研究思路与方法,突破了以往只是提供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单调数据,并将学生选拔与录取、课程与教学、领导与管理等问题分散开来研究的传统方法。同时还将高等教育发展中质和量的变化态势放到从“精英→大众→普及”的阶段历史发展背景下进行分析。这种全方位、全程性的研究方法和思想不仅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制订高等教育改革和发政策提供了借鉴,而且为人们综合考虑高等教育发展问题提供了新思路,有助于人们进行不同国家高等教育发展历程的多维度比较研究。

通过分析欧美高校学术人员基于不同价值取向而选择不同发展模式的现实状况,将这些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道路概括为4种模式,实际上这4种模式也是欧美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中的4种不同选择。这种将理论探讨与实践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为后人提供了一种开展综合研究的新思路,也为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道路的选择提供了参照。

分析了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中普遍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并就这些矛盾和问题从新理念、新视角、新观念上进行解说与阐述,尤其是分析了“大学毕业生失业”现象的本质,指出“大学毕业生过剩”是一种短视与浅见,并肯定了高等教育大众化在促进人口素质提高和促进社会进步方面的积极作用,为高等教育大众化扫清了认识上的障碍。

总之,马丁·特罗教授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理论,给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正因如此,他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一提出来,就被人们普遍接受,并在世界范围流传开来。

(收稿日期:2005-09-15)